

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

陳國燦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佛教傳入中國，通常都認為是在東漢明帝時，《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載：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台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東漢傳入中國的佛經，除《四十二章經》以外，在小乘佛教方面有安世高、安玄等人的譯經，在大乘空宗方面有支婁迦讖、支謙等人的譯經，其譯梵為漢的地點，都在東漢的都城洛陽。[註 1] 任繼愈先生依據《開元釋教錄》的統計指出：「東漢從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到漢獻帝延康元年（西元二二〇年），這一五四年間，譯經者有十二人，譯出佛經（包括佛教教律等一切著作）共二九二部，合三九五卷。」[註 2]這些經卷大多只在上層統治者之間傳播，正由於流傳不廣，故到唐開元間，只保存下來九十七部一百三十一卷，[註 3]影響也不是很大。

魏晉時期是佛典在中國大翻譯、大傳播的時期，它一直延續到南北朝。這些早期譯出的佛經寫本，在內地是早已散失殆盡。然而，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古本寫經中，尚有一些遺存，由此，人們往往以為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首先是由中亞傳到吐魯番、敦煌，接著到河西，然後再傳到中原，這是一種誤解。實際情況是：佛經的東傳，首先是到達當時的政治中心洛陽、長安，而後再逐漸流布到河西、敦煌以至吐魯番，呈現出佛教經典東傳後再西漸的過程，下面擬對這種過程作一點概略的考察。

一、現存最早的佛經寫本與魏晉譯經

現存最早的佛經寫本，是吐魯番出土的西晉竺法護等人的譯寫經。一九一四年前後，日本大谷探險隊在新疆鄯善縣的吐峪溝古寺窟遺址獲得西晉元康六年（二九六）寫本《諸佛要集經》，經尾有題記載：

- 1 (元) 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氏菩薩法護手執胡
- 2 (本，口) 授聶承遠，和上弟子沙門竺法首筆
- 3 (授，□) 令此經，布流十方，載佩弘化，速成正(果)。
- 4 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寫已
- 5 凡三萬十三章，合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六字[註 4]

此經從「口授聶承遠」看，應是首譯於洛陽，從「竺法護部分譯經年表」[註 5]得知，聶承遠長期在長安或洛陽協助法護譯經，他元康元年（二九一）八月還在洛陽。此經可能是元康二年（二九二）正月在洛陽已由聶承遠協助口授譯成稿本，到元康六年（二九六）又在酒泉由竺法首整理，並寫以「布流十方」。吐魯番出土的此件，書法正規、頗帶隸書體，疑是法首寫出後往西流至高昌郡的原本。

與上件同時期的遺物，還有一件《聖法印經》，這是在日本知恩寺傳世經本中找到的。經後尾題為：

- 1 佛說聖法印經一卷
- 2 元康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月氏菩薩沙門
- 3 曇法護於酒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
- 4 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光。[註 6]

這是西元二九四年竺法護在酒泉譯出佛經的記錄。竺法護，本名曇摩羅刹，是西晉的譯經大師，也是佛經傳入中國、進行大批量譯梵為漢的第一人，一直為中國古代佛學界所傳頌，據《高僧傳》載：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敦）煌。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燉（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註7]

竺法護對佛經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有著重要的貢獻，其譯經事業，在他西行之前，就已經開始。他往西域求法的時間，約在西晉泰始九年（二七三）至太康四年（二八三）間。在此前的泰始二年（二六六）十一月八日，他在「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口授翻譯了《須真天子經》[註8]；泰始五年（二六九）七月廿三日，譯出《方等泥洹經》；六年（二七〇）九月三十日，譯出《德光太子經》；十月，又出《寶藏經》[註9]。至於他從西域帶回梵經「自燉（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也應具體分析，在一百多部經中，據現所知，能明確在敦煌譯寫出的有兩部，即太康五年（二八四）二月譯出的《修行道地經》七卷和十月譯出的《阿難越致遮經》三卷，這兩部的助譯者都是法護在敦煌的弟子法乘。而《賢劫》、《正法華》、《光讚》等大部分經典，則是在長安或洛陽譯出的。由此看，西晉時的佛經翻譯及傳播中心在長安和洛陽。

其實，長安、洛陽作為佛經的譯寫中心地點，早在漢魏時就是如此。東漢明帝時，由沙門竺摩騰譯出的《四十二章經》，原由秦景等人帶至洛陽，竺摩騰將其譯成漢文後，即藏於洛陽的蘭台石室。漢桓帝時，安世高譯出的三十四部四十卷經，也是在洛陽。其後，譯經大師支謙等，逢桓、靈亂世，多避難江南。支謙至建康，於孫吳黃武（西元二二二—二二九年），建興（二五二—二五三年）年間，譯出佛經三十六部[註10]，康僧會也譯出了《六度集經》。三國末年的朱士行在於于闐所得的二十卷《放光經》，也是到晉武元康初、在陳留倉垣水南寺譯出的。這些都說明，在佛經初傳中國的東漢、魏晉時期，佛經的翻譯基地在中原的洛陽、長安和建康等地，而佛教的傳播中心地區也在中原。

還須指出的是，現存三世紀寫經中，有些屬於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近人的仿古偽作，如傳為李盛鐸舊藏的所謂《佛說五王經》，其經後記有：「景初二年歲戊午九月十六日，敦

煌太守倉慈，為眾生供養，熏沐寫已。」景初為曹魏年號（西元二三七—二三九年），此時是否有紙寫經，殊屬可疑，對此，池田溫教授業已指出[註 11]。又如日本京都博物館藏的「元康五年九月三日比丘善惠供養」的《戒緣》卷下也是可疑的。在日本奈良，有赤井南明堂藏的「泰始九年歲在癸巳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張華寫記」的《大般涅槃經第十卷》[註 12]，均屬這一類，這種作為，多是商人漁利，假託名人碩士於敦煌所出，這是我們在考察早期寫經時要特別留意的。

二、十六國時期的譯經

現存的十六國時期的譯經，有些源出河西。吐魯番出土西元四世紀的佛經寫本真品較多，如吐峪溝出的前秦「甘露二年（三六〇）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的《維摩經義記》卷二[註 13]，這是在《維摩詰經》基礎上產生的《義記》，自魏晉以來，《維摩詰經》在中原地區已有多種譯本，如孫吳支謙的二卷譯本、西晉竺法護的二卷譯本、還有竺叔蘭的二卷譯本、鳩摩羅什的三卷譯本。一經四人異出，故後多有《維摩經義記》，乃在於貫通諸譯本義理。

在吐魯番吐峪溝還出有一件「甘露元年（三五九）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傳寫的《譬喻經》[註 14]，此經也是來源於內地的譯本，自漢魏以降，有安世高、竺法護、釋法炬、求那毗地和康法遂等五種譯本，而以法護所譯最豐，名為《譬喻三百首經》，二十五卷，這是早譯於內地，又逐漸傳至酒泉，再西傳至吐魯番者。此酒泉，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的高昌郡下的酒泉城[註 15]。

十六國時期，內地戰亂頻仍，而河西地區自前涼至北涼，相對安定。特殊的歷史背景，使以武威為中心的河西，成為新的譯經基地。此時的河西，佛事大興，幾乎每個政權的統治者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們期望著佛業興旺能帶來政權的穩定，國祚長久，國泰民安，於是開窟建寺，大力提倡譯經傳寫，包括傳寫一些在內地和江南已經譯出的一些佛教經典。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這一時期的佛經寫本，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從河西流入的。在吐魯番的吐峪溝，日本大谷探險隊曾獲得一件北涼寫經《優婆塞戒卷七》，現將此卷尾題轉錄於下：

《優婆塞戒》卷七

歲在丁卯夏四月廿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識，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廿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 [註 16]

這是北涼統治者的世子沮渠興國在其都城涼州武威請曇摩讖譯出的《優婆塞戒》，丁卯，即北涼玄始十六年（西元四二七年），西傳至吐魯番的時間，或就在此年之後不久。

廣為後世傳播的《金光明經》，便是初譯於北涼的一部大經，據《出三藏記集》載：此經乃「晉安帝時天竺沙門曇摩讖至西涼州，為偽……河西王大沮渠蒙遜譯出」。[註 17]約在三十年前，在吐魯番市郊安樂城遺址，出土了一批早期窖藏的寫經，其中就有這部《金光明經》初傳至高昌的寫本，其尾題為：

《金光明經》卷第二

凡五千四百卅三言

庚午歲四月十三日於高昌城東胡天南太后祠下，為索將軍佛子妻息合家，寫此金光明經一部，斷手記竟，筆墨大好，書者手拙，具字而已，後有□□□□之吉，疾成佛道。

[註 18]

此庚午歲，學術界大都將其確定在西元四三〇年，即北涼承玄三年，距前述曇摩讖譯出《優婆塞戒》的丁卯歲（四二七），只晚三年，這應是《金光明經》譯出後，立即西傳至高昌郡的最早的傳寫本。此經先譯於河西，及時流入高昌，在「太后祠」下，為索將軍全家寫經祈福，也與沮渠氏王室勢力統治著高昌郡密切相關。

三、南北朝至隋唐內地寫經的西傳

北魏攻北涼，沮渠氏退守，西逃高昌時，也從河西帶去了一批寫經。在北魏統一北方後，高昌獨立建國，而敦煌則納入北魏統治之下。在敦煌所出經卷中，也有不少譯於內地而後流入敦煌者，S.996 號為北魏馮晉國施寫的《雜阿毗曇心經》，現將其題記摘記如下：

《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 用紙十五張 一校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名曰毗曇。是以使持節、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梨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紙，用答皇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

大代太和三年歲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於洛州所書寫成訖[註 19]

大代太和三年，即西元四七九年，北魏鮮卑政權，初建國時稱「代」，故常自稱「大代」。這是北魏貴族在洛州大批量寫經傳到敦煌的一個代表，除此卷外，馮晉國的寫經以及共他北魏貴族的寫經傳入敦煌者，還可以找到很多。

除北魏寫經外，還有南朝的寫經，如出土於吐魯番，現藏於德國國家圖書館、有蕭道成題記的《妙法蓮華經》，其一片尾記殘存有：

- 1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
- 2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 3 郡開國公蕭道成，普 [註 20]

另有一件，題記完整，錄如下：

- 1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 2 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開國公蕭道成，普為
- 3 一切敬造供養[註 21]

此二片均無紀年，但從蕭道成官職可以判明年代。池田溫氏將其標定為劉宋昇明元年（四七七）[註 22]，即蕭道成篡宋建南齊政權、稱齊高帝（四七九）前二年所寫，此經有可能為賜予，而後轉入高昌者。

到了隋唐，國家統一，但由內地轉入敦煌、吐魯番以至庫車的佛經仍然不少，唐朝宮廷寫經正本也傳到了敦煌。除佛教經典以外，一些內地高僧對佛教義理發揮的著述，也傳到了敦煌、吐魯番等地。

四、中國佛經的中國特色

前列的這些情況表明：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經義的翻譯傳播，最早不是發生在敦煌、吐魯番，而是發生在中原政治生活中心地區，如長安、洛陽以及建康、武威等地。佛經經過翻譯加工後，才逐漸西傳到河西、敦煌、吐魯番。

佛經的這種東傳而後西漸的過程，賦予了敦煌、吐魯番出土寫經主體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它表現為：

(一)魏晉時的譯經，大多摻進了當時中國固有的一些社會意識形態，如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玄學思想，就影響著對佛經經義的理解和翻譯。使佛經中的一些義理，得到玄學社會觀的詮釋，如作為大乘佛教的「般若」學說，本來是一種用否定的思辨方法去論證現實世界是虛幻不實的理論，而魏晉時的譯經，則將此種理論，用玄學的「貴無」論來加以闡釋，協助竺法護譯經的聶承遠等人即具這種思想傾向，後來釋道安更是用「本無」的原理去闡明般若思想。[註 23]

(二)當佛教義理不易被國人所接受時，譯經師們往往借助中國現實生活中通行的義理來加以解釋。概括地說，就是古代中國深深植根於文化生活各個層面的儒家的天命觀、天人合一學說；老莊的虛無觀，甚至被廣大群眾作為生活常規的綱常倫教，再加上東方專制主義的皇權思想等等。

如此一來，印度佛教經典的許多義理，傳到中國後，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受到了改造，成為中國化的佛教。正因為如此，佛教才受到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認同、信仰，才得以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布。

洎至隋唐，佛教在中國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中國的高僧們圍繞著對佛經教義的不同理解和認識，作了許多新的發揮，產生了不同的宗派，這種新發展趨勢，又進一步使佛教更趨中國本土化，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涵。

佛經傳入中國呈現出的中國化的特點，也必然影響到接踵而出現的中國佛教藝術，無論是佛寺的構建、佛窟的開鑿，還是佛像的塑造，也都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在敦煌莫高窟、張掖馬蹄寺、永靖炳靈寺的佛像浮雕、壁畫繪像、滿鋪的彩繪極樂世界，天王菩薩們的造型、服飾等，也無不受到當世中國社會生活的感染。

因此，今天研究敦煌的佛教及佛教藝術，除了研究其與印度佛教的共性外，還應研究它的中國本土化的特性方面。如同對佛經的研究一樣，應著意於佛教藝術的中國化特色，以及它中國化進程中，特殊的中國意識形態文化背景。

【註釋】

- [註 1]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安世高傳〉、〈支婁迦讖傳〉。
- [註 2]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版），第四頁。
- [註 3]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四七七頁下。
- [註 4]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卷下（日本：國華社，一九一五年六月），第一頁。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圖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書，一九九〇年三月），錄文七十四頁。
- [註 5]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的《諸佛要集經》與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略〉，刊《敦煌學輯刊》創刊號，一九八三年八月（總第四期）。
- [註 6]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書，一九九〇年三月），第七十四頁。此譯經尾記，在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中亦有記載，內容、文字基本一致，惟「法護」名前少一「曇」字，「大乘常光」作「大乘常住」（見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蘇晉仁、蕭東子點校本），第二七七頁。
- [註 7]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竺曇摩羅刹傳〉。
- [註 8]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蘇晉仁、蕭東子點校本），第二六七頁。
- [註 9] 同 [註 8]，卷二，第三十二—三十八頁。
- [註 10] 《出三藏記集》卷二，按支謙所譯，在同書卷十三〈支謙傳〉中作「二十七經」。又據《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支謙譯有「《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
- [註 11]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七十一頁。
- [註 12] 陳國燦，〈對赤井南明堂藏兩件敦煌寫卷的考察〉，《敦煌學輯刊》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 [註 13]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第七十九頁。
- [註 14]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七十六頁錄文，圖版二。本件現藏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 [註 15] 吳震，〈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辯〉，刊《西域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十七—二十七頁。
- [註 16] 日本《西域考古圖譜》下，第十八頁。
- [註 17] 同 [註 8]，卷二，第五十二頁。
- [註 18] 《新中國出土文物》圖版一二二，刊載此寫經（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又《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八十四頁載有錄文。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新文豐出版公社，一九九七年），第一四二頁，將此件列在建初二年，即西元四九〇年。

論文 / 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

ISSN : 1609-476X

[註 19]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八冊，第一八三頁（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又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圖二十、第九十二頁有錄文。

[註 20] 藤枝晃、托馬斯（Thomas Thilo）編，《德藏吐魯番佛經目錄》（德文）Ch. 422, TIIT 2071 號。

[註 21] 同 [註 20] Ch. 2521, Ch.2836 號。該書圖版三十三附有本件圖版。

[註 22]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九十一—九十二頁。

[註 23]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第十二—十三頁。